引用格式：张永奇，单德朋. 劳动时间配置对服务消费释放的影响研究J]. 技术经济，2026，45(8)：134-149.
Zhang Yongqi，Shan Depeng. The impact of working time allocation on the expansion of service consumption[J]. Journal of Technology Economics，2026，45(8)：134-149.

劳动时间配置对服务消费释放的影响研究

张永奇[1]，单德朋[2]
（1.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日照 276826；2.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 610041）

摘 要：“十五五”时期，服务消费扩容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家政服务是其中的关键领域。然而，劳动时间延长强化了家庭时间约束，并以非货币成本形式阻碍服务需求转化，使城市家庭未必因收入增长而同步扩大家政服务消费。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时间效应”分析框架，考察劳动时间对家政服务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时间延长显著抑制家政服务消费，在控制收入、资产等因素后，这一效应仍然稳健，说明时间分配是独立于收入约束之外的重要因素。第二，基于服务治理成本视角，劳动时间延长对服务消费的抑制，并非仅源于可支配时间减少，而是通过抬升家庭服务购买中的治理成本，表现为加重认知负荷、提高信任成本与强化角色规范，进而阻碍家庭服务需求向市场消费转化。第三，数字素养和制度保障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风险预期，但难以完全消除时间刚性带来的结构性障碍。研究表明，服务消费不足并不只是需求偏弱问题，时间约束已成为更隐蔽、更持久的消费边界。释放家政服务消费潜力、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应从增强工时弹性、重塑家庭分工、优化服务供给和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协同发力。研究揭示了劳动时间延长阻滞家政服务需求向有效消费转化的内在机制，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时间效应；劳动时间；家政服务消费；消费悖论；数字素养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6)08-0134-16
DOI：10.12404/j.issn.1002-980X.J26030507

一、引言

家政服务作为典型的生活性服务业，是缓解家庭照料压力、促进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支点[1-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为家政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导向。在老龄化加速、家庭小型化与双职工普遍化的共同作用下，家庭传统的非市场性照料功能不断弱化[5-6]，照料与家务需求加速外溢至市场，家政服务因而成为维系城市家庭运转不可或缺的支撑[7-8]。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2025年，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开展家政服务促消费活动”等重点任务。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将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布局，其中家政服务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新的政策定位。

近年来，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共同推动家政服务业较快增长，行业供给能力在从业人员增加、平台运营发展和服务标准化推进中持续提升[9-11]。商务部披露，2023年全国家政服务业营业收入为1.16万亿元，

收稿日期：2026-03-05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重点项目“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视角下四川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及其配套政策研究”(SCJJ25QH25)；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四川民族地区农村低收入人口稳定增收帮扶政策研究”(2026SYB18)
作者简介：张永奇(1996—)，博士，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和照料；(通信作者)单德朋(1985—)，博士，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现代化。

2024 年增至 1.23 万亿元①。同期，居民收入增长不断放松家庭的预算约束，劳动时间则维持高位。2024 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 49 小时②。收入提高增强了家庭的支付能力，较长工时则提高了家庭自行承担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按照时间配置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家庭应更倾向于购买家政服务，以替代部分家庭劳动[12]。然而，居民人均家庭服务支出仅由 2019 年的 110 元增至 2023 年的 128 元③。增幅明显低于市场规模扩张速度。在收入与工时同步上升的背景下，家政服务消费并未相应增长，呈现“长工时-低消费”的结构性不匹配，说明供给扩张向实际消费转化的过程仍受一定制约。

这一困境的根源并非支付能力不足，而是家庭照料责任与市场供给的结构性错位，致使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实际支出[13-14]。即便在经济条件宽裕的家庭中，服务性支出比例依然偏低，家庭对家政服务的采纳率整体仍较有限[15]。城市家庭照料任务持续内部化，既反映出制度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确定和文化规范约束，也暴露出家政服务交易环境不完善、供需匹配不充分的问题。既有研究多从收入水平和消费观念解释服务消费不足，对劳动时间阻滞需求转化的机制关注不够。

劳动时间延长本应提高家政服务需求，城市家庭为何未同步增加市场化购买？其约束究竟来自支付能力，还是认知、信任与其他因素？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可能贡献如下：

第一，研究视角的拓展。现有文献讨论家庭消费决策时，多从收入约束和资产约束两条主线展开，认为支付能力决定消费水平[16]。近期研究开始关注时间约束的独立作用[17-19]，分别从工作时长减少、工作忙碌、超时劳动等角度证实了时间对消费的制约效应。不过，既有研究多以“劳动时间挤占消费时间”解释整体消费不足，对劳动时间与家政服务消费之间的关系讨论不足。尽管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家政服务外包有助于缓解时间约束[20-21]，但在中国情境下，长工时并未必然带来家政服务消费增长。劳动时间延长可能同时压缩决策时间、加重无偿照料压力并抬升服务治理成本，进而阻滞需求转化。本文据此将劳动时间与家政服务消费纳入同一框架，丰富了劳动时间与服务消费的相关研究。

第二，理论机制的深化。既有研究多从价格和收入解释家政服务消费不足，较少从机制层面关注服务消费的形成过程。本文认为，长工时影响的并非仅是闲暇时间，还通过三重渠道重塑家政消费决策：一是削减信息搜寻和质量甄别的认知资源，抬高决策门槛；二是限制社会网络中的经验分享与信任传递，增加交易成本；三是强化家庭内部性别化的照料责任内化，持续压制外包动机。由此，劳动时间延长并非简单减少闲暇时间，而是通过认知负担、关系支持不足和家庭规范约束，削弱家政服务需求向实际消费的转化，从而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拓展了服务消费不足的机制解释。

第三，政策含义的延伸。既有政策讨论多集中于补贴供给端或规范市场秩序，较少从制度环境和行为约束角度审视消费转化瓶颈。虽有研究注意到数字平台对降低家政匹配成本的潜在作用[22]，但中国情境下尚缺乏深入讨论。本文发现，制度环境和数字素养分别从制度可信性与服务可达性两个渠道缓解时间压力：前者可以通过完善服务标准和信用体系，降低风险成本；后者能够通过提高信息获取和匹配效率，降低时间成本。这表明，家政服务消费不足还受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服务获取能力制约。政策重点应由“降价格”转向“降摩擦”，通过提升试点覆盖率和居民数字素养增强服务可及性，从而推动时间压力转化为实际消费。

二、文献回顾

（一）时间资源约束与家庭消费结构的理论基础

家庭不仅是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更是在家务劳动与消费行为交织中不断演化的资源配置场域[23]。

① 商务部，《商务部召开〈关于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若干措施的通知〉专题新闻发布会》，2025-04-18，https://www.mofcom.gov.cn/zcjd/gnmy/art/2025/art_58cc47487a75444284039916ff0e4bb9.html。

② 国家统计局，《2024 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主要发展目标顺利实现》，2025-01-17，https://www.stats.gov.cn/zwfwck/sjfb/202501/t20250117_1958332.html。

③ 数据来源为历年《住房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等公开数据，由作者整理计算。家庭服务消费在统计口径中虽未单独列示家政服务支出，但其内涵与家政服务高度重叠，尤其在涵盖日常家务及照料类服务方面具备较好代表性。该指标可能包含部分加工维修等相关服务，与狭义家政服务并不完全一致，故仅用于刻画消费变化趋势。

长期以来,家庭决策受时间与收入的双重约束,其资源分配模式由制度结构与市场环境共同塑造[24]。Becker[12]的"家庭生产函数"理论指出,时间是家庭决策的核心约束。劳动时间延长会压缩家务劳动与照料投入,提高家庭对市场化服务的潜在需求。在此基础上,Apps 和 Rees[25]构建集体劳动供给模型,指出家庭成员间的时间配置具有协同博弈属性,尤其在照料与教育等高时间成本任务上,市场外包可显著提升家庭整体效用。进一步地,Stratton[26]的集体模型揭示,家务外包不仅取决于机会成本,更受性别偏好在"谁来做"决策中的关键影响,突破了传统时间可得性理论的解释边界。由此可见,服务性消费实质上是家庭职能在制度约束下的结构性再配置,其边界演化可由交易成本理论加以刻画。外部服务供给稳定、制度保障充分时,家庭倾向于将部分职能转移至市场,以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与资源配置最优化[27-28]。

这一过程也体现为制度层面对"时间"资源的规范与响应。Juster 和 Stafford[29]提出的五类时间使用框架,将个体时间划分为市场工作、家务劳动、个人照料、休闲和休息等类型,后续被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时间使用统计体系吸收,推动了时间使用研究的制度化发展。随着市场劳动参与的提升,家庭对节时型服务的偏好持续增强[30],服务经济中时间可获得性、持续性与等待成本等维度日益成为家庭消费选择的重要考量[31]。在此背景下,性别分工作为家庭内部调节机制发挥关键作用。研究表明,女性市场就业虽部分替代家务劳动,但男性参与受限于性别角色与职业结构[32]。尤其在双职工的育儿家庭中,女性就业与照料责任的叠加显著提升了家政服务使用频率[33-34],家庭职能通过市场外包机制得以重构。因此,家政服务消费不仅是时间资源约束下的理性选择,更是家庭与市场之间制度边界演化的具体体现。

(二)劳动时间与服务性消费的国内经验研究

相较于国际研究,国内对"劳动时间-服务消费"关系的系统识别仍不足,近年来才随着时间利用数据丰富和家庭职能重组加快而逐步受到关注。张卫东[35]引入时间约束,构建"完全价格-完全预算"模型,揭示了收入与时间双重约束下的最优消费选择机制。魏翔和惠普科[36]证实闲暇时间对消费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强调时间资源的独立影响力。杨碧云等[13]进一步指出,服务性消费是家庭在双重约束下通过市场外包实现功能重构的制度性选择,体现效率逻辑向家庭领域的延伸。常态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市场服务替代家庭生产,服务消费起到提高福利与劳动生产率的作用[37]。刘娜等[17]发现,工作时间每减少1%,家庭消费支出上升1.59%,验证了时间释放效应。部分后续研究区分了工作时间的影响机制。罗连化和周先波[38]识别出收入效应与时间挤出效应的非线性交互路径:中等劳动强度下,时间投入通过收入提升带动消费扩张;高劳动强度区间,时间约束反而抑制交通、文娱等高时间占用型消费,反映出时间作为行为变量的边际非对称性。这一识别表明,时间不仅是物理约束,更具有结构化选择偏向,对服务消费产生多维影响。

此外,随着城市通勤成本上升与生活节奏加快,家庭对服务替代手段的依赖不断加深。章元和王驹飞[39]指出,通勤时间的持续增长压缩了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时间,促使城市居民通过外卖、洗衣、家政等服务"购买时间",维系家庭生活的基本弹性。尹志超等[40]则发现,移动支付等数字工具释放了碎片时间,尤其在高压就业群体中,便利型服务消费显著增长,体现出服务消费的结构性分化与群体异质性。

(三)家庭职能转移与家政服务消费的制度逻辑

家政服务消费不应以收入弹性为核心解释,而应从家庭结构变化和制度环境调整中加以理解。狭义上,指家庭通过市场雇佣他人完成清洁、烹饪、照料等日常再生产事务;广义上,则涵盖家庭为维持运转、协调分工、满足照料需求而发生的各类服务支出,体现家庭在时间紧张与功能变化中的调整。与传统耐用品消费不同,家政服务不仅受收入水平影响,还与家庭结构、性别分工和照料责任配置密切相关。

学界逐步将家政服务置于家庭组织与劳动力市场交叉的制度结构中加以分析。Folbre[41]指出,家务劳动与照料工作往往具有不可压缩性和强情境依赖性,难以实现标准化和完全市场化,家政服务因而处于家庭与市场的边界地带。Saraceno[42]指出"家庭外包"实质上是国家、市场与家庭之间功能边界的再分配,尤其在少子化与女性就业常态化背景下表现突出。Morel[43]进一步指出,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为导向的制度安排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分化,使照护和家政等再生产劳动更多转移给低技能及低收入群体,并形成新的阶层性服务依赖。Coulibaly 等[44]利用加拿大魁北克省2016年家政补贴改革的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框架,采用对数正态门槛模型(log-normal threshold model)进行估计,研究发现,补贴计划使目标群体的家政

服务需求价格弹性约为0.74，其中月度购买频次弹性为0.59，显著高于使用强度弹性（0.14）。这表明财政补贴主要通过提升服务使用频率而非每次使用时长发挥作用。在中国语境下，周海伟和厉基巍[45]强调家政服务的就业支撑功能，吴心越[46]则将其发展瓶颈归结为服务质量与制度供给不足。

既有研究多从价格失灵或制度缺位解释家政服务消费不足，较少关注需求侧时间约束。本文认为，家政服务并非单纯的货币消费，其市场化转化还依赖消费者对信息搜寻、质量甄别、信任建立与过程协调等环节的时间投入。时间既是生产资源，也是消费投入要素[12]。劳动时间延长虽能增加家庭收入，却容易压缩服务消费所需的非货币投入，形成“消费的时间成本悖论”：越是需要借助市场缓解照料压力的家庭，越可能因时间稀缺而难以完成市场化购买。时间紧张不仅减少可支配时间，还可能通过加重认知负荷、抬高信任成本和强化角色规范约束，削弱支付能力向实际消费的转化。基于此，本文将时间约束纳入家政服务消费研究框架，并考察制度环境与数字素养的调节作用，以期解释家政服务消费“有需求、难转化”的形成机制。

三、政策背景和理论机制

（一）政策背景

家政服务的兴起并非消费偏好的自然演变，而是家庭再生产职能在外部劳动制度与内部照料资源的双重挤压下向市场的转移。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双职工家庭增多，使传统家庭照料模式难以为继。长工时与高强度劳动进一步压缩了家庭用于照料的时间，形成广义上的“时间赤字”。因此，家政服务消费的关键不在于家庭是否“需要”服务，而在于其能否将照料需求转化为可执行、可持续和可信任的市场购买行为。

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推动家政服务的政策工具虽常体现为税收抵扣或财政补贴，但其深层逻辑却是通过制度设计帮助家庭“购买时间”。法国“家政服务通用支票”制度简化雇佣流程、降低税负，将家政服务从高协调成本的私人交易转化为制度化服务。瑞典、德国、意大利等国围绕托育与照护形成补贴、抵扣与公共服务协同机制，旨在减少家庭无酬劳动负担、释放可支配时间。换言之，国际政策的核心在于降低服务搜寻、雇佣、监管等环节的制度成本，而非单纯降低价格。

相较之下，中国家政服务消费面临更为复合的约束。家庭小型化与双职工普遍化使照料资源持续收缩，而托育、养老等社会化支持体系仍在完善，许多家庭仍依赖祖辈照料或女性无酬劳动[47-48]。近年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及相关部门推动的“提质扩容”“家政兴农”等行动，已将家政服务纳入消费扩容与民生体系建设中，但政策重点仍偏向扩大供给、提升质量与降低价格。然而，家政服务是涉及私人空间进入、照料责任转移与持续监督的关系型服务。即便家庭具备支付能力和外包意愿，若工作时间过长、时间高度碎片化，仍可能因缺乏执行能力而无法启动消费。因此，本文以劳动时间为切入点，将家政服务消费不足的解释从价格收入约束延伸到家庭时间配置层面。进一步揭示时间紧张如何削弱服务消费的启动能力，为理解家政服务需求转化不足与家庭照料责任社会化提供微观证据。

（二）理论机制

传统家庭经济学认为，劳动时间的延长应通过“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共同促使家庭增加对服务性消费的依赖，尤其在家政服务等“时间节省型”消费领域尤为显著[12]。然而，现实研究却普遍发现，即便家庭具备收入增长基础，面对工作时间压力上升时，并未同步扩大对家政服务的消费，甚至出现了压缩趋势[15]。家政服务消费的滞后表明，其行为逻辑并非简单随时间和收入变化而调整，而是受服务供给、家庭角色认知和制度支持的共同影响。传统劳动与闲暇选择模型难以充分解释这一现象，亟须引入新的分析视角。

借助“服务治理成本理论”，本文指出家政服务作为一种典型的亲密型服务，其消费行为不仅具有市场交换属性，更表现为高度组织化与制度依赖性的行为过程，涉及交易搜寻、过程监督、风险控制与关系协调等多重隐性成本。相较于标准化商品交易，家政服务通常具有明显的时间占用、关系嵌入和制度依赖特征。其一，服务交付通常发生在家庭空间内，既占用服务使用时间，也需要投入沟通、监督和协调时间；其二，交易过程高度依赖信任关系和个性化适配，消费者需持续判断服务者的照护能力、情绪劳动和家庭契合度；其三，在公共照护供

给不足的背景下,家政服务往往承担部分家庭再生产职能,其消费决策也受政策供给、社会规范和性别分工影响。由此,将“时间效应”理解为服务治理成本的重要来源,即劳动时间增长不仅压缩家庭可支配时间,也通过认知判断、关系协调和规范约束等路径增加治理负担,进而抑制家政服务的市场化采纳。

第一,认知资源约束路径。劳动时间延长削弱家庭对服务交易全过程的有效管理能力。家政服务的消费并非一项即时完成的市场行为,而是一种需要持续管理的交易过程,涉及服务供给方的搜寻与筛选、合同关系的确立与执行、服务过程的监督与反馈等多个环节,实际运行成本远高于标准化商品消费[49]。在此过程中,家庭作为交易的执行主体,需要投入稳定的时间与精力以维系交易秩序与服务质量。然而,随着主要照料责任承担者有酬劳动时间延长,其协调服务流程的时间资源被压缩,导致家庭交易执行能力下降。这种能力缺口并非意味着服务需求消失,而是形成“具备消费意愿但缺乏可行路径”的使用障碍。尤其存在工作时间波动(如加班、通勤时长显著)或照料任务复杂度高(如婴幼儿或失能老人照护)的家庭中,服务外包往往因无法稳定完成管理任务而被迫搁置。

第二,社会信任结构弱化路径。长工时不仅压缩了家庭的闲暇时间,也减少了邻里互动、熟人交流和经验分享的机会,削弱了关系型信任的积累基础。家政服务具有非标准化和家庭空间进入特征,质量判断、过程监督和责任界定均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在缺乏稳定推荐网络和有效信用机制的情况下,家庭对外部服务者的可预期性和责任可追溯性判断不足,服务外包的风险感知随之上升。因此,劳动时间延长并非仅通过减少可支配时间抑制消费,也会通过削弱信任生成机制,提高家政服务的交易成本。社会信任水平越低,这一路径越可能强化,家庭也越倾向于将照料责任内化而非市场外包。

第三,家庭内部性别分工路径。劳动时间增长未打破家庭照料责任的性别固化结构,导致服务替代路径失灵。家政服务外包并非单纯的效率选择,而是嵌入家庭性别分工、责任分配与文化规范之中的决策过程。在当前多数城市家庭中,即便夫妻双方的劳动时间同步延长,照料任务仍普遍由女性承担,其责任并未随着市场工作时间的变化而对等转移[50]。这种结构性不对称,源于家庭责任分配中的传统性别规范④。女性更容易在家庭协商中让渡职业、承担照料,照料也更常被视为女性责任,而非可由市场替代的服务需求;男性参与不足则削弱了家庭外包照料的共同决策基础。由此,照料责任难以转化为家政服务需求,家政替代效应难以释放。正因如此,推动照料责任的性别再分配,已成为国际照护政策改革的重要方向[51]。在传统观念较强、公共照护资源不足的地区,这一约束更为突出。

进一步来看,劳动时间对家政服务消费的影响并非在所有情境下都相同,而会随着制度环境和服务获取能力的差异而变化。这一机制根源于服务消费的转化路径高度依赖外部治理体系的支持能力,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能否有效降低服务获取成本;其二,能否稳定家庭对服务连续性与安全性的预期。只有在制度环境与数字素养同时具备这两项支撑时,劳动时间延长所释放的替代性需求才有可能顺利转化为实际消费行为;反之,则可能因制度托底缺位或环境能力不足而持续阻滞消费启动。

在制度环境维度上,关键在于政府能否通过公共政策分担家庭照料责任,并为家政服务消费提供可信支撑。家政服务试点通过完善服务标准、信用体系和供需对接机制,降低家庭在选择、监督和评价服务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其在劳动时间压力上升时更愿意借助外部服务[52]。制度供给越充分,家庭越容易将家政服务纳入日常安排,从而减弱劳动时间延长对服务消费的抑制作用;相反,若制度支持不足,家庭更可能依赖内部人力,并通过推迟或放弃消费来应对照料压力。

在数字素养维度上,核心在于家庭能否将服务需求转化为实际消费。在数字平台日益主导家政服务供给的背景下,服务可达性成为关键门槛。高数字素养家庭能熟练使用平台完成搜索、交易、监督与纠纷处理,借助标准化流程与信用评价机制克服信息不对称[53-54]。部分城市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社区智慧康养中心”等实践,已实现服务资源的动态调配与低门槛可及。反之,低数字素养家庭即便需求强烈,也因操作障碍与风险规避而难以启动服务,从而强化了劳动时间对家政服务消费的抑制。

④ 本文所称“传统性别规范”,是指社会长期形成并通过家庭分工与日常实践不断强化的性别角色期待。这类规范往往将家务和照料责任更多归于女性,进而影响家庭成员的时间配置与服务消费决策。

四、数据来源和变量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2 年度数据。CFPS 自 2010 年启动，覆盖全国 25 个省份（未含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宁夏、海南及港澳台地区），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比例与规模相结合的抽样设计，能够在家庭与个体两个层面形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追踪数据库[55]。与其他大规模社会调查相比，CFPS 不仅系统记录了家庭和个体的经济活动、教育、健康与社会态度，还重点收录了与劳动力供给、时间分配和家庭消费结构相关的信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家政服务消费”变量仅在 2022 年度问卷中单独设置并获得有效统计，此前各轮调查均未涵盖该类支出数据。这使得本文能够在全国性大样本的基础上，首次开展劳动时间与城市家庭家政服务消费的关系检验。数据处理方面，对样本进行严格筛选：保留 18~60 周岁具有市场劳动能力的劳动力个体，限定城市户口以匹配服务消费背景，剔除关键变量取值为负的无效样本，并删除控制变量中的显著异常值。

使用城市居民样本，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家政服务需求呈现明显的城市集聚特征，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外递减，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等因素紧密关联[56]。农村地区因服务供给缺位，观测到的“零消费”多为“无法消费”而非“无需求”，纳入样本会引致估计偏误。其二，家政服务消费决策嵌入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制度环境之中。城市中产阶级的服务外包行为与封闭街区、住房制度、社会权力关系深度交织[57-59]。综上，采用城市居民样本，有助于准确识别时间约束与家政服务消费的理论关联，避免因服务不可得造成的计量偏误。

（二）变量设置

在变量设置方面，以家政服务消费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以家庭年度家政支出的人均值衡量。考虑到样本中存在零支出家庭，参照 Chen 和 Roth[60] 关于含零值变量的处理方法，对相关变量作适当转换，以保留完整样本并缓解偏态分布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为有酬劳动时间，以受访者调查周内实际工作小时数衡量，用以刻画其市场劳动时间投入强度。控制变量主要从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展开。个体层面包括人口特征、教育水平和就业状况等变量；家庭层面包括收入状况、家庭结构和社会性支出等变量，以控制可能影响家政服务消费的微观因素。同时，模型进一步控制省份固定效应，用以吸收地区发展水平、城市化条件和制度环境等省际差异，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偏误。表 1 展示了主要变量的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 1 可以看出，家政服务消费均值仅为 0.206，多数家庭相关支出极少。无论是占家庭收入比重还是与其他消费项目对比，其占比均处于低位，反映家政服务在家庭预算中空间有限，增长潜力较大。受访者平均每周工作 47.6 小时，高于法定工时且差异显著，超时劳动较为普遍。样本以中年、已婚、全职劳动者为主，该群体虽面临时间与照料压力，家政服务消费却未相应释放，为分析劳动时间延长对家政服务消费的抑制效应提供了直观背景。

为进一步刻画高工时群体的现实特征，统计了每周劳动时间超过 47.6 小时样本的行业分布。结果显示⑤，该群体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建筑业及教育等行业。尽管行业属性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及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家政服务消费	ln（家庭家政服务支出除以人口规模）	0.2060	0.9999
劳动时间	受访者每周实际工作时长	47.6589	15.7862
年龄	受访者的年龄	39.8179	10.2926
年龄平方	年龄的二次项	1691.3701	843.7704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368	0.4987
婚姻状况	已婚=1，其他=0	0.7905	0.4070
全职工作经历	是=1，否=0	0.8511	0.3561

⑤ 为节省篇幅，实证结果备索。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及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受教育年限	受访者接受教育的总年限	12.2118	4.8507
家庭社会资本	ln(家庭年度人情往来支出)	7.2315	2.7918
家庭收入	ln(家庭人均纯收入)	11.8483	0.7603
家庭资产	ln(家庭净资产)	12.6959	3.4764
家庭其他消费支出	ln(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家政服务消费支出)	9.9458	1.1542
家庭人口规模	人口数量	3.6396	1.7438
观测值	2988		

不同,但普遍具有劳动强度较高、收入增长有限和工作节奏不稳定等特征,表明高工时并不必然转化为更强的消费能力。基于此,进一步检验劳动时间对家政服务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三)模型构建

基准回归框架如式(1)所示。

$$Y_i = \alpha + \beta Labour_time_i + \lambda X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i 为城市居民;Y 为家政服务消费;$Labour_time$ 为劳动时间;X 为影响家政服务消费的一系列变量;ε 为随机扰动项;α、β 为待估系数。本文以城市居民劳动时间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劳动时间延长对家政服务消费的影响。若 β 估计结果为负,表明劳动时间延长对家政服务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

五、经验证据

(一)基准结果

表 2 展示了劳动时间对服务消费的基准估计结果。(1)列控制个体与家庭特征后,劳动时间系数显著为负;(2)列加入省份固定效应后,结果仍保持稳定;(3)列将被解释变量扩展为生活性服务消费,合并家政、外出就餐和保健相关支出后,劳动时间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可见,劳动时间延长并未带动服务外包增加,反而与家政等服务消费下降相伴随。这说明"时间紧张-市场替代"的经典逻辑在高协调成本服务中并非自动成立。家政、保健等服务不仅需要支付能力,还需要信息搜寻、质量甄别、信任建立和过程协调。劳动时间延长不仅提高外包动机,而且压缩服务购买所需的决策时间和组织能力,并放大质量不确定与信任成本。因而,劳动时间同时具有"市场替代效应"和"消费压缩效应",而表 2 结果表明后者占据主导。需要说明的是,受 CFPS 消费分类限制,本文无法完整识别外卖、即时配送等平台化服务消费。本文揭示的是,家政等高信任、强协调类服务的潜在需求,可能因时间约束和治理成本而难以转化为实际消费。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家政服务消费	家政服务消费	生活服务消费
劳动时间	-0.0019***	-0.0016**	-0.0080***
	(0.0007)	(0.0007)	(0.002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观测值	2988	2988	2988
R^2	0.7179	0.7310	0.2422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将标准误聚类到省级层面,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主要从模型设定、变量构造与估计方法三个维度进行了扩展性检验。第一,为排除极端值干扰,对模型中所涉连续型变量(包括劳动时间、年龄、收入、资产等)统一实施 1%与 99%的缩尾处理。从表 3 的(1)列可以看出,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说明结论不依赖于极端观测。第二,考虑因变量存在部分观测值为零的截断特征,采用 Tobit 模型替代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进行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缩尾处理	Tobit	加入控制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Lasso 回归	消费分位排名	加入农村居民
劳动时间	−0.0018***	−0.0073	−0.0019***			−0.0003**	−0.0002
	(0.0007)	(0.0047)	(0.0007)			(0.0001)	(0.0003)
超时工作(0-1)				−0.0601***	−0.0392*		
				(0.0203)	(0.0205)		
身体健康状况			−0.0235**				
			(0.0101)				
微信使用			0.0425				
			(0.0852)				
通勤时间			0.0015***				
			(0.0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988	2988	2988	2988	2988	2988	1175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估计，以控制因变量截断可能引起的估计偏误。(2)列中劳动时间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方向与基准结果一致。第三，从控制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口径两个方面进行检验。(3)列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身体健康状况、微信使用和通勤时间，以控制健康差异、数字工具接入和日常通勤负担的影响，劳动时间系数仍显著为负。(4)列将连续型工作时间替换为“超时工作”虚拟变量，并以 47.6 小时作为经验断点识别长工时个体，结果显示超时工作系数显著为负。第四，为缓解高维控制变量和模型函数形式设定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进一步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在控制变量维度较高的情况下，利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分别估计结果变量和处理变量关于控制变量的条件期望函数，并对二者进行残差化处理。在此基础上，结合 5 折交叉拟合估计处理效应，以降低过拟合对参数估计的影响。(5)列中劳动时间系数方向与基准模型一致，且仍保持显著，表明基准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此外，还开展了两项敏感性检验。首先，将家政服务消费额转换为样本内分位排名，以 0-1 尺度刻画消费相对位置。(6)列中劳动时间系数仍显著为负，说明更换被解释变量口径后，基准关系依然成立。其次，纳入农村居民后，(7)列中劳动时间系数仍为负但不再显著，表明城乡合并后估计关系有所弱化。考虑到农村地区家政服务市场发育不足、外包渠道有限，该结果并不意外，也进一步说明本文以城市家庭为主样本具有合理性。

(三)内生性处理

为缓解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偏误，采用“职业-全国平均工时”作为劳动时间的工具变量。该变量反映同一职业内部相对稳定的工时规范，与个体实际工作时间具有较强相关性；同时，其构造过程中剔除了个体自身信息，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体层面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变量设定借鉴了劳动经济学中利用职业、地区等结构性变量识别外生差异的思路[61-62]。

表 4 中(1)列的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劳动时间的影响显著为正，系数为 0.4025，第一阶段 F 统计量为 58.07，高于常用经验阈值 10，说明不存在明显弱工具变量问题。(2)列的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劳动时间对家政服务消费的影响仍显著为负，系数为−0.0079，与基准回归结果方向一致。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劳动时间	家政服务消费	家政服务消费	家政服务消费	家政服务消费	家政服务消费	家政服务消费
劳动时间	−0.0079**	−0.0125*	−0.0712***	−0.0473**	−0.0475**	−0.0684***	
	(0.0036)	(0.0064)	(0.0221)	(0.0201)	(0.0201)	(0.0263)	
工具变量	0.4025***						
	(0.0528)						

续表

变量	(1)	(2)	(3)	(4)	(5)	(6)	(7)
	劳动时间	家政服务消费	家政服务消费	家政服务消费	家政服务消费	家政服务消费	家政服务消费
F 统计值	58.07						
过度识别检验 *p* 值			0.0631				
内生性检验 *p* 值			0.005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2906	2906	2890	2153	2974	2977	1520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此外，进一步借鉴罗连化和周先波[38]的研究思路，采用工作场所虚拟变量作为替代工具变量，包括户外、车间、家里、其他室内和运输工具内等类型，并以办公室作为参照组。过度识别检验的 p 为0.0631，在5%水平下未拒绝工具变量外生性假设；内生性检验的 p 为0.0054，说明采用工具变量估计具有必要性。(3)列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劳动时间系数仍显著为负，进一步支持劳动时间延长抑制家政服务消费的结论。总体来看，在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后，劳动时间延长对家政服务消费的抑制作用仍然成立。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稳健性，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估计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具体包括最近邻1:2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和马氏距离匹配。(4)列~(7)列结果显示，不同匹配方法下 *ATT* 估计值均为负，且保持统计显著。这表明，在尽可能缓解样本选择偏误后，劳动时间延长与家政服务消费下降之间仍存在稳定关系。结合工具变量估计和匹配检验结果，本文基准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四)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结果的稳健性，从家庭结构、个体时间调控能力与区域发展水平三个维度展开分组回归，考察劳动时间对家政服务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异。结果显示⑥，该效应在双职工家庭与上下班时间固定群体中更为显著，表明在缺乏内部调节机制的情境下，家政服务消费更易受时间压力的抑制。相较之下，非双职工家庭及拥有弹性作息的人群对时间变化具备更强的自我缓冲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工时所带来的外部服务使用障碍。

此外，区域异质性结果亦表明，劳动时间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区域划分标准，将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与海南10个省(市)界定为“东部地区”。这些区域普遍面临家庭小型化、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等现实特征，服务消费的发生更依赖于高效、可信、标准化的供给体系。一旦服务获取门槛偏高或匹配机制不足，时间压力便更易转化为消费受限，从而形成“有支付能力却难以实现消费”的典型困境。整体来看，异质性结果印证了基准回归，并揭示时间压力的作用边界受个体调节能力与制度替代通道的双重约束。

六、进一步分析

(一)劳动时间限制家政服务消费的机制检验

与标准化商品不同，家政服务嵌入家庭日常生活和私人空间，其消费不仅取决于价格与收入，还受认知约束、信任关系和家庭分工规范影响。家政服务购买需要经历信息搜寻、服务甄别、沟通协调和过程监督，劳动时间延长会压缩家庭可支配时间和注意力资源，使其难以完成服务比较、质量判断和交易安排，进而形成以时间贫困为表征的认知约束。同时，家政服务具有经验品和信任品属性，家庭空间进入又会放大风险感知；照料劳动长期嵌入性别分工，也使家庭更倾向于内部消化服务需求。由此，劳动时间延长通过时间贫困所体现的认知约束，并叠加信任成本和分工惯性，阻滞潜在需求向实际消费转化。

为检验认知约束机制，结合表4的时间贫困测度经验，主要采用必要时间扣除法构造时间贫困指标。时间贫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忙碌感”，而是个体在完成必要生理活动、无酬家庭劳动、有酬劳动及通勤

⑥ 囿于篇幅，实证结果备索。

后，剩余自由支配时间不足的状态。已有研究从稀缺理论出发指出，时间贫困会通过占用注意力和压缩认知资源影响个体心理状态与行为决策[63]。据此，采用必要时间扣除法，能够更直接刻画劳动时间对自由时间和认知资源的双重挤压，也更适合用于截面数据下识别劳动时间影响家政服务消费的机制。

具体而言，从一周 168 小时总量中扣除个体用于个人维护（66 小时）、未成年子女照料（7 小时/人/周）、婚姻状态推导的家务劳动、有酬工作时间及通勤时间，计算自由支配时间。为提高识别度，设定“最低照料基准”（2 名儿童）与“婚姻状态调整的成年人数”（已婚为 2 人，未婚/离异/丧偶等为 1 人），并限制通勤时间上限（30 小时/周），构建统一的适配性公式。

若无未成年子女：

$$X = 91.5a - 21 - L - C \tag{2}$$

若有未成年子女：

$$X = 91.5a - 21 - 7(c + 2) - L - C \tag{3}$$

其中；a 为成年人数；c 为未成年子女数量；L 为有酬劳动时间；C 为劳动者上下班周通勤时间；X 为剩余时间，即闲暇时间。当 $X < 14$ 小时/周（即每日可支配时间不足 2 小时）时，判定该个体处于时间匮乏状态。为降低绝对阈值设定的任意性，进一步参照相对时间贫困的测度思路[67]，以周剩余时间分布最低四分位界定相对时间贫困，并将其作为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5 结果表明，认知约束是劳动时间延长抑制家政服务消费的重要机制。按照家庭生产理论，劳动时间延长会提高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理论上应增强家庭购买家政服务的动机。但这一替代逻辑成立的前提是，家庭仍具备完成信息搜寻、服务甄别、预约沟通和过程监督的认知与组织能力。本文以时间贫困作为认知约束的经验表征，结果显示，劳动时间延长显著提高时间贫困概率，说明长时间劳动不仅压缩自由时间，也削弱家庭处理服务信息、判断质量和协调交易的认知能力。由此，家政服务采纳成本上升，潜在需求可能被延迟或内部消化，形成“需求增强—决策受限—消费受阻”的悖论。

表 4　时间贫困的测度思路和方式

测度思路	核心逻辑	代表文献	常见处理
总工作时间临界思路	将市场劳动、家务劳动和无偿照料等总工作时间超过特定临界值者界定为时间贫困	Bardasi 和 Wodon[64]	超过总工作时间中位数一定倍数
综合测度框架	将时间贫困作为收入贫困的补充，系统区分必要时间、自由支配时间及其阈值设定	Williams 等[65]	统摄绝对阈值与相对阈值
必要时间扣除思路	从总时间中扣除睡眠、个人照护、家务照料、通勤和市场劳动等必要时间，考察剩余时间是否不足	Vickery[24]；Harvey 和 Mukhopadhyay[66]	扣除必要时间后判断时间赤字；可设置必要闲暇阈值（如 2 小时）
相对时间贫困线思路	借鉴收入贫困线，以自由支配时间低于样本分布中的相对标准界定时间贫困	Kalenkoski 和 Hamrick[67]	低于自由支配时间中位数一定比例
主观时间压力思路	根据个体对时间不足或时间压力的主观感知识别时间约束	Hamermesh 和 Lee[68]	基于时间压力感知或量表划分

表 5　劳动时间影响家政服务消费的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绝对时间贫困	相对时间贫困	女性家务	社会信任
劳动时间	0.0046***	0.0054***	0.0042***	−0.0011*
	（0.0003）	（0.0004）	（0.0004）	（0.0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988	2988	2988	2988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除认知约束外，性别分工和社会信任进一步解释了服务替代机制为何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表5显示，劳动时间延长显著提高女性承担超额家务的概率，说明工时压力并未促成家庭照料责任的均衡再分配，反而强化了“女性主责”的结构惯性。同时，家政服务具有较强的私人空间进入属性，服务质量难以标准化，高度依赖对服务者的信任。根据回归结果，劳动时间延长显著降低个体社会信任水平，在家政服务这类高亲密度、低标准化场景中，信任不足会直接抬高心理成本和风险预期，从而降低服务采纳意愿。

进一步的交互项检验表明⑦，认知约束、性别分工与社会信任之间的两两交互项均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表明上述机制更多表现为相对独立的约束条件，而非显著的协同放大效应。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家政服务市场标准化不足、信息不对称较强，单一约束即可能成为消费转化的瓶颈，机制之间的叠加效应相对有限。总体来看，劳动时间延长对家政服务消费的抑制，部分经由认知约束、性别分工和社会信任传导，但三条路径并未完全解释这一关系，仍存在其他未观测因素的影响。

（二）超越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二元博弈视角

传统家庭经济学通常认为，劳动时间延长会通过增加收入和提高时间机会成本，推动家庭将家务劳动外包给市场。但本文的估计结果显示，劳动时间延长反而显著降低家政服务消费。该发现说明，对于家政服务这类依赖时间投入、信任建立和过程协调的亲密型服务而言，消费是否发生并不只取决于支付能力和替代动机，也受服务使用过程本身的制约。

为解释这一偏离，本文引入“时间效应”作为独立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第三种机制。劳动时间过长会同时压缩家庭可支配时间、加重认知负担和角色冲突，从而提升搜寻、比较、沟通及监督家政服务的隐性成本。这意味着，家政服务消费不仅受制于“支付能力”，更受限于“决策精力、时间协调与信任构建”等执行条件。当劳动时间超出阈值，即便需求存在，家庭也可能因执行成本过高而推迟或放弃消费。

表6进一步表明，单纯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解释家政服务消费不足并不充分。首先，劳动时间延长与月税后工资显著正相关，并且在收入波动、收入变异系数和残差绝对值三类指标上均呈负向关系，说明更长工时并未削弱支付能力，也未加剧收入不稳定。由此可见，家政服务消费不足不能简单归因于收入约束。其次，替代效应存在递减边界。工资上升会增强家庭购买家政服务以替代家务劳动的动机，但当日劳动时间超过一定临界点（约13小时）后，过度劳动带来的疲惫感和决策负担会削弱需求转化能力。因此，时间效应的关键不在于“没有钱买”，而是超长劳动挤占了服务选择、沟通与使用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本文据此认为，劳动时间延长对家政服务消费的影响，不能只从收入增加或家务替代角度理解，还需要关注时间压力对家庭消费决策的约束。这与刘娜等[17]关于时间压力抑制家庭消费的研究结论相呼应。本文进一步指出，在家政服务这类需要信任、沟通和持续协调的消费场景中，消费不仅取决于能否支付，也取决

表6　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深入研讨

变量	（1）	（2）	（3）	（4）	（5）	（6）
	每月税后工资（对数）	收入波动（组内标准差）	收入变异系数	收入波动（残差绝对值）	替代效应	替代效应
（日）劳动时间	0.0081***	−0.0006**	−0.0000*	−0.0009*	0.1753***	0.4075***
	（0.0028）	（0.0003）	（0.0000）	（0.0005）	（0.0056）	（0.0220）
（日）劳动时间的平方						−0.0153***
						（0.00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988	2828	2828	2974	2988	2988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为精确识别核心机制，分别构建收入波动与替代效应指标。收入波动通过三种方法测量：组内标准差法（基于教育、婚姻等五维分组计算收入对数标准差）、变异系数法（标准差与组均值之比）及回归残差法（提取收入回归残差绝对值）。替代效应指标用以量化时间机会成本：基于年工资与总工时计算实际小时工资，通过回归（控制年龄、性别、教育、行业及省份固定效应）预测排除内生性的潜在工资，将预测小时工资与每日工作时间相乘，乘积越高，家务劳动机会成本越大，服务外包动机越强。

⑦ 囿于篇幅，实证结果备索。

于家庭是否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完成服务选择与使用。将时间效应纳入分析，有助于解释“有需求、低转化”的现象，也为理解服务消费不足提供了更贴近家庭决策过程的解释。

（三）调节效应的拓展分析

为考察劳动时间影响家政服务消费的条件差异，进一步检验制度环境与数字素养的调节作用。前文显示，劳动时间延长会压缩家庭用于服务搜寻、预约、沟通和监督的时间，从而限制家政服务消费。但这一影响取决于外部交易环境。若地区家政服务体系较为完善，服务标准、信用记录、社区嵌入和供需对接机制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与交易风险，家庭即使在时间受限的情况下，也更容易完成服务购买。由此，较好的制度环境可能削弱劳动时间对家政服务消费的负向影响。

本文采用家政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数量刻画地区制度环境。该试点地区通过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推动家政进社区、健全信用体系和规范服务标准等方式，降低家政服务的制度性交易成本[3]。表 7 结果显示，劳动时间与试点数量的交互项系数为 0.0018，且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家政服务体系建设能够显著缓解劳动时间对家政服务消费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影响劳动时间向家政服务消费的转化。只有当服务标准清晰、交易成本较低及制度可信度较高时，时间压力才更可能转化为实际需求。因此，家政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的意义不只是扩充供给，更在于通过标准规范、信用约束和交易保障降低制度性成本，提升时间约束下家政服务消费的实现可能。

图 1 从数字素养维度提供了更多证据。本文采用双重测量策略检验数字素养的调节效应：一是绝对水平指标，即个体对网络在工作、学习、娱乐、社交和生活五个维度重要性评价的算术平均值，反映其在数字场景中的适应能力；二是相对位置指标，将个体得分与所在省份平均水平相除，以控制地区间数字基础设施差异。无论采用传统（绝对）指标还是省份相对指标，数字能力较高者在劳动时间延长时，家政服务消费的下降幅度均较小。数字素养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服务匹配与线上预约等环节的搜索与协调成本，提高了家庭在有限时间约束下的交易效率。省份相对指标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也表明这一效应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服务发展水平有关[69]。总体而言，制度环境与数字素养分别通过降低交易风险和时间成本，缓解了劳动时间延长对家政服务消费的抑制效应。由此可见，释放家政服务消费潜力的关键在于降低需求转化成本，而非单纯扩大服务供给。

表 7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变量	家政服务消费
劳动时间	−0.0017***
	（0.0006）
家政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数量（合并到省份层间）	−0.1195*
	（0.0683）
劳动时间×家政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数量（合并到省份层间）	0.0018***
	（0.0005）
控制变量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2888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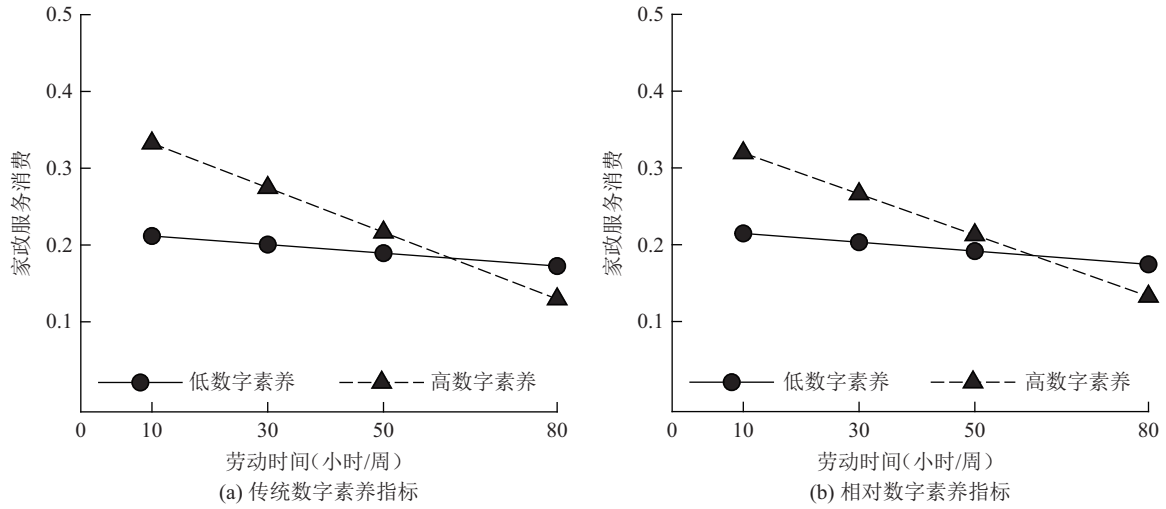


图 1　数字素养的调节作用

七、研究结论和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生活服务消费便利化水平，优化家政等领域服务消费体验。2026年4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进一步将家政服务列为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在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的政策背景下，家政服务被寄予释放家庭劳动力与带动服务消费的双重功能。然而，政策扶持和平台化发展虽推动供给能力提升，但居民端消费转化却并未同步改善，显示出供给扩张与需求释放不足之间的结构性错位。这意味着，家政服务消费不足不能仅从支付能力解释，还需考察家庭决策过程中的时间约束、信任成本等。已有研究较多讨论时间对消费的影响[70-72]，但其在家政领域的作用机制尚待揭示。

本文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表明，劳动时间延长显著抑制家政服务消费，且该效应在控制收入、资产等因素后依然稳健。这说明劳动时间不仅是一般性时间资源变量，更是制约服务消费的重要行为约束。据此提出“时间效应”解释框架：劳动时间的持续挤压不仅压缩家庭可支配时间，还削弱了个体信息处理、服务识别与消费决策能力，使家庭即便具备支付能力，也难以实现需求向消费的转化。由此，城市家庭家政服务消费不足的关键，不在于支付能力，而在于消费启动能力的受限。

进一步看，时间效应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发挥作用：其一，认知资源路径。劳动时间延长挤占注意力与认知投入，推高信息搜寻、质量比较和风险判断的心理成本，进而导致决策延迟与消费搁置。其二，信任资本路径。家政服务具有非标准化和不完全契约特征，消费达成高度依赖社会网络与经验性信任；而劳动时间压力压缩社会交往和信息筛选空间，抬高了服务交易的信任门槛。其三，性别分工路径。在传统家庭分工格局下，女性往往同时承担有酬劳动与无酬家务，劳动时间延长进一步强化其双重负担，并在家庭伦理和性别规范约束下固化家务内部化倾向，从而形成对家政服务消费的结构性锁定。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将“时间效应”界定为家政服务治理成本的重要来源，揭示劳动时间延长通过认知判断、关系协调和规范约束三重路径增加家庭治理负担，进而抑制家政服务的市场化采纳。该框架揭示，“有需求、低转化”的根源在于家政服务的高信任、强协调属性与家庭时间约束不相匹配。政策重点应由消费刺激转向制度优化和服务协同，降低家庭搜寻和甄别等成本，推动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消费。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第一，增强工时弹性，是激活家政服务消费的重要前提。家政服务不是即时性购买，家庭需要投入时间完成信息搜寻、服务比较、预约沟通和过程监督。劳动时间过长虽然可能增加服务外包需求，却会压缩家庭启动和管理服务消费的能力，使需求停留在潜在状态。因此，家政服务消费不足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更应看到超长劳动对家庭消费能力的挤压。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需要把规范劳动时间、提高工时弹性和保障休息休假结合起来，为家庭释放服务需求、完成消费决策创造更充分的时间条件。

第二，应将性别分工再平衡纳入家政服务消费扩容的政策框架。家政服务不是简单把家务交给市场，更是对家庭照护责任的重新分配。若家务和照料仍被默认为女性责任，即使购买服务，搜寻、筛选和监督也可能继续由女性承担，外包反而转化为新的管理负担。因此，政策不能只关注家政消费规模，还应关注家庭内部谁在承担照护责任，谁在承担服务购买的组织成本。一方面，要推动育儿假、护理假和弹性工作安排更好落实，减少照护责任对女性就业和休息时间的挤压；另一方面，要鼓励男性参与育儿和老人照护，并对多孩家庭、失能老人家庭和双职工家庭给予服务补贴或服务券支持，推动家务劳动由多由女性承担转向家庭共同分担和社会支持。

第三，提高家政服务可交易性，也需要降低信息成本和风险成本。家政服务进入家庭私人空间，服务质量难以事前判断，责任边界也比一般消费更复杂。居民不愿使用家政服务，往往不是没有需求，而是担心人员是否可靠，收费是否透明，出现问题能否追责。对此，市场建设不能停留在增加供给数量，而要把交易规则做实。应完善实名登记、资质认证和背景核验，建立稳定的服务评价和信用记录，降低家庭选择服务时的信息成本。同时，需要有效发挥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作用，推动合同签订、责任保险和投诉处理规范化。通过智能匹配、价格公示和服务留痕，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和责任边界，降低家庭使用顾虑，让家庭

敢于购买，也能够放心使用。

第四，顺应“十五五”时期完善普惠服务、发展社区服务和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政策方向，应以就业友好型照护服务供给承接家庭基础需求，进而释放家政服务消费潜力。当前，双职工、育幼和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庭照护压力上升，许多需求被家庭自行吸收，既挤压劳动参与，也难以形成稳定消费。公共服务的作用并非替代家政市场，而是通过普惠托育、临时看护、居家养老和社区助餐等服务，缓解刚性照护压力，降低家庭进入市场前的时间成本和风险顾虑。在此基础上，依托政府购买服务、社区转介和服务清单，将分散照护需求接入规范渠道，从而推动家庭照护压力转化为可持续的家政服务消费。

参考文献

[1] 毛中根. 服务消费发展：现状、比较及建议[J]. 人民论坛，2023(18)：40-45.

[2] 王震. 以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民生需求[J]. 人民论坛，2025(4)：38-41.

[3] 梁超，熊瑞祥，王素素，等. 家政服务业发展提升了女性就业水平[J]. 经济学(季刊)，2024，24(4)：1290-1307.

[4] RAZ-YUROVICH L，TSACHOR-SHAI A. Does outsourcing of domestic work reduce gender inequality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within households? — A couple-level panel analysis[J]. Social Forces，2026，104(3)：917-940.

[5] 单德朋，王英. 基于时间赤字的隐性贫困测度原理、方法与应用[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5)：125-144.

[6] 杨博文. 中国家政行业老年照料工作的低回报率：禀赋差异还是职业歧视?[J]. 财经研究，2022，48(8)：94-108.

[7] 张永奇，单德朋. 家庭照料对家政服务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J]. 财经科学，2025(9)：122-134.

[8] 许友君. 空间如何塑造劳动关系——双重劳动空间中的育儿嫂与雇主互动[J]. 社会学评论，2024，12(3)：212-234.

[9] 陈倩，胡湛. 银发经济浪潮下的家政养老服务：需求演变、供给挑战与策略创新[J]. 家政学刊，2024，1(3)：215-223.

[10] 何晓波，石成，宗庆庆. 我国城市家政市场的工资——基于街道层面需求数据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2023，23(5)：2009-2024.

[11] 袁晓燕，施夏敏，石磊. 城市规模、服务业发展与流动女性就业[J]. 学术月刊，2023，55(9)：58-67，112.

[12] BECKER G S.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 Economic Journal，1965，75(299)：493-517.

[13] 杨碧云，张凌霜，易行健. 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 财贸经济，2014(6)：122-136.

[14] KORNRICH S，ROBERTS A. Household income，women's earnings，and spending on household services，1980—2010[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18，80(1)：150-165.

[15] TRÜBNER M，NISIC N. Sociocultural barriers to outsourcing housework：Unraveling the non-use of domestic servi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2024，48(3)：e13042.

[16] 尹志超，刘嘉怡，李凤. 新个人所得税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非线性消费函数的反事实分析[J]. 经济研究，2026，61(2)：213-236.

[17] 刘娜，李静，张川川. 被时间束缚的消费：工作时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42(9)：29-51.

[18] 马天平，卢旭蕊. 工作忙碌制约了家庭消费升级了吗？——来自文体休闲消费的替代效应证据[J]. 经济学报，2021，8(4)：207-234.

[19] 张磊，胡月. 缓解消费的闲暇约束：超时劳动与农民工消费[J]. 财经科学，2026(2)：142-156.

[20] MAZZOLARI F，RAGUSA G. Spillovers from high-skill consumption to low-skill labor market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3，95(1)：74-86.

[21] SHAH A K，MULLAINATHAN S，SHAFIR E. Som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too little[J]. Science，2012，338(6107)：682-685.

[22] TICONA J，MATEESCU A. Trusted strangers：Carework platforms'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on-demand economy[J]. New Media & Society，2018，20(11)：4384-4404.

[23] COX R. House/work：Home as a space of work and consumption[J]. Geography Compass，2013，7(12)：821-831.

[24] VICKERY C. The time-poor：A new look at poverty[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77：12(1)：27-48.

[25] APPS P F，REES R. Collective labor supply and household produc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105(1)：178-190.

[26] STRATTON L S. The role of preferences and opportunity costs in determining the time allocated to housework[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02(3)：606-611.

[27]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a，1937，4(16)：386-405.

[28] 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87(3)：548-577.

[29] JUSTER F T，STAFFORD F P. Time，goods，and well-being[M]. 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5.

[30] JUSTER F T，STAFFORD F P. The allocation of time：Empirical findings，behavioral models，and problems of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1，29(2)：471-522.

[31] DURRANDE-MOREAU A，USUNIER J C. Time styles and the waiting experience：An exploratory study[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1999，2(2)：173-186.

[32] BAXTER J. Power attitudes and time：The domestic division of labour[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1992，23(2)：165-182.

[33] FLANAGAN F. Theorising the gig economy and home-based service work[J].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9, 61(1): 57-78.
[34] BRAUNSTEIN E, BOUHIA R, SEGUINO S. Social reproduc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44(1): 129-156.
[35] 张卫东. 引入时间约束的消费者最优选择[J]. 财经科学, 2002(6): 24-26.
[36] 魏翔, 惠普科. 闲暇时间与消费增长——对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财贸经济, 2007(11): 82-88, 129.
[37] 钟粤俊, 陆铭, 奚锡灿, 等. 市场替代家庭生产: 基于大数据看生活服务业发展[J]. 财贸经济, 2024, 45(7): 74-93.
[38] 罗连化, 周先波. 超时工作会挤出居民家庭消费吗? ——基于 CFPS 数据的经验证据[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62(3): 167-180.
[39] 章元, 王驹飞. 城市规模、通勤成本与居民储蓄率: 来自中国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19, 42(8): 25-49.
[40] 尹志超, 仇化, 路慧泽. 突破消费时空限制: 通勤时间、移动支付与家庭消费[J]. 财经科学, 2022(4): 92-105.
[41] FOLBRE N. The invisible heart: Economics and family values[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42] SARACENO C. Varieties of familialism: Comparing four southern European and East Asian welfare regimes[J].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16, 26(4): 314-326.
[43] MOREL N. Servants for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estic services in Europe[J].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2015, 22(2): 170-192.
[44] COULIBALY S, FORTIN B, ISABELLE M. Demand for domestic help service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5, 238: 107234.
[45] 周海伟, 厉基巍. 家庭生产社会化与居民消费: 趋势、机理和动因[J]. 消费经济, 2021, 37(6): 30-39.
[46] 吴心越. 市场化的照顾工作: 性别、阶层与亲密关系劳动[J]. 社会学评论, 2019, 7(1): 75-86.
[47] 陶艳兰. 代际互惠还是福利不足? ——城市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中的代际交换与社会性别[J]. 妇女研究论丛, 2011(4): 13-19.
[48] 吴帆, 闫本超. 中国多代家庭情感联结的类型和结构特征——基于对 50 个城乡家庭网络样本的观察[J]. 人口与发展, 2024, 30(3): 51-63.
[49]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50] HE H, LI S X, HAN Y.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 correspondence study with policy change in China[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23, 41(2): 361-387.
[51] HOOK J L. Care in context: Men's unpaid work in 20 countries, 1965-2003[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6, 71(4): 639-660.
[52] 易祯, 徐龙强. 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储蓄-消费”决策的影响[J]. 金融研究, 2025, 536(2): 188-206.
[53] AKERMAN A, LEUVEN E, MOGSTAD M. Information frictions, interne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ance and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22, 14(1): 133-163.
[54] 刘诚, 夏杰长. 线上市场、数字平台与资源配置效率: 价格机制与数据机制的作用[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7): 84-102.
[55] XIE Y, HU 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J]. Chinese Sociological Eeview, 2014, 47(1): 3-29.
[56] 鄢继尧, 赵媛, 许昕, 等.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中国城市家政服务需求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1, 41(11): 56-64.
[57] SHARMA S. Contradictions of neoliberal urbanism: The case of paid domestic workers in Indian cities[J]. Critical Sociology, 2023, 49(4/5): 865-883.
[58] FENTON A, FITCHETT J. Views from above: The continued discrimination of domestic workers living in the apartment blocks of Northern Johannesburg[J]. Urban Studies, 2025, 62(14): 2807-2823.
[59] 张永奇, 姚壮, 单德朋. 赋能与激活: 家政服务业发展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J]. 中国经济学, 2026(1): 28-51, 251-253.
[60] CHEN J, ROTH J. Logs with zeros? Some problems and solution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4, 139(2): 891-936.
[61] CARD D. Earnings, schooling, and ability revisited[J]. 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1995, 14: 23-48.
[62] ANGRIST J D, IMBENS G W. Two-stage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of average causal effects in models with variable treatment intensit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95, 90(430): 431-442.
[63] 孙晓敏, 杨舒婷, 孔小杉, 等. 时间贫困内涵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 稀缺理论视角[J]. 心理科学进展, 2024, 32(1): 27-38.
[64] BARDASI E, WODON Q. Working long hours and having no choice: Time poverty in Guinea[J]. Feminist Economics, 2010, 16(3): 45-78.
[65] WILLIAMS J R, MASUDA Y J, TALLIS H. A measure whose time has come: Formalizing time poverty[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28(1): 265-283.
[66] HARVEY A S, MUKHOPADHYAY A K. When twenty-four hours is not enough: Time poverty of working parent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7, 82(1): 57-77.
[67] KALENKOSKI C M, HAMRICK K S. How does time poverty affect behavior? A look at eat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J].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2013, 35(1): 89-105.
[68] HAMERMESH D S, LEE J. Stressed out on four continents: Time crunch or yuppie kvetch?[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7, 89

(2)：374-383.
[69] 张永奇，单德朋. 数字中国纵深推进背景下数实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OL].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2026-06-29].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188.C.20260612.1100.002.
[70] 任明丽，孙琦. 退休与家庭旅游消费：经济状况与闲暇时间的调节作用[J]. 南开管理评论，2020，23(1)：4-17.
[71] KIM S，FILIMONAU V，DICKINSON J E. Tourist perception of the value of time on holidays：Implications for the time use rebound effect and sustainable travel practic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23，62(2)：362-381.
[72] LIU H，LI Q，XU T. Parental retirement and offspring tourism consumption：A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perspective[J]. China & World Economy，2026，34(2)：220-248.

The Impact of Working Time Allocation on the Expansion of Service Consumption

Zhang Yongqi[1]，Shan Depe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 276826，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the expansion of service consumption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omestic services are a key part of this process. However，longer working hours tighten household time constraints and raise the non-monetary costs of service use. Urban households may therefore fail to increase domestic service consumption in line with income growth.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a "time-effect"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effect of working time on domestic service consumption was examined. Firstly，longer working hours significantly reduce domestic service consumption. The result remains robust after income，assets and other factors are controlled. Time allocation therefore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nstraint independent of income. Secondly，the negative effect is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governance costs. Longer working hours do more than reduce disposable time. They also raise the governance costs involved in purchasing household services. Cognitive burdens and trust costs are increased. Household role norms are also reinforced. The conversion of household service demand into market consumption is consequently impeded. Third，digital literacy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can partly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perceived risk. However，the structural barriers created by rigid time constraints cannot be fully remov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sufficient service consumption cannot be attributed solely to weak demand. Time constraints have become a more hidden and persistent boundary of consumption. Greater working-time flexibility should be promoted. Household divisions of labour should be reshaped. Service supply should be improve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should also be strengthened. It reveal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by which extended working hours hi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usehold service demand into effective consumption，thereby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sector.

Keywords：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time effect；working hours；domestic service consumption；consumption paradox；digital literacy